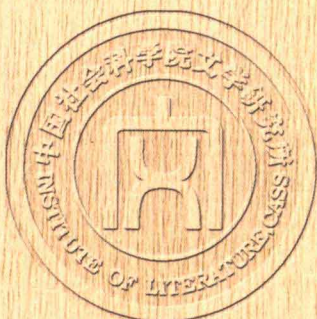


告别一个学术时代

——樊骏先生纪念文集



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建所六十年

文学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告别一个学术时代

——樊骏先生纪念文集

文学研究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097-4674-5

I. ①告… II. ①中… III. ①樊骏(1930~2011) - 纪念
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5013 号

告别一个学术时代 ——樊骏先生纪念文集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倩郢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张倩郢 范明礼

责任校对 / 李向荣 钱月红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67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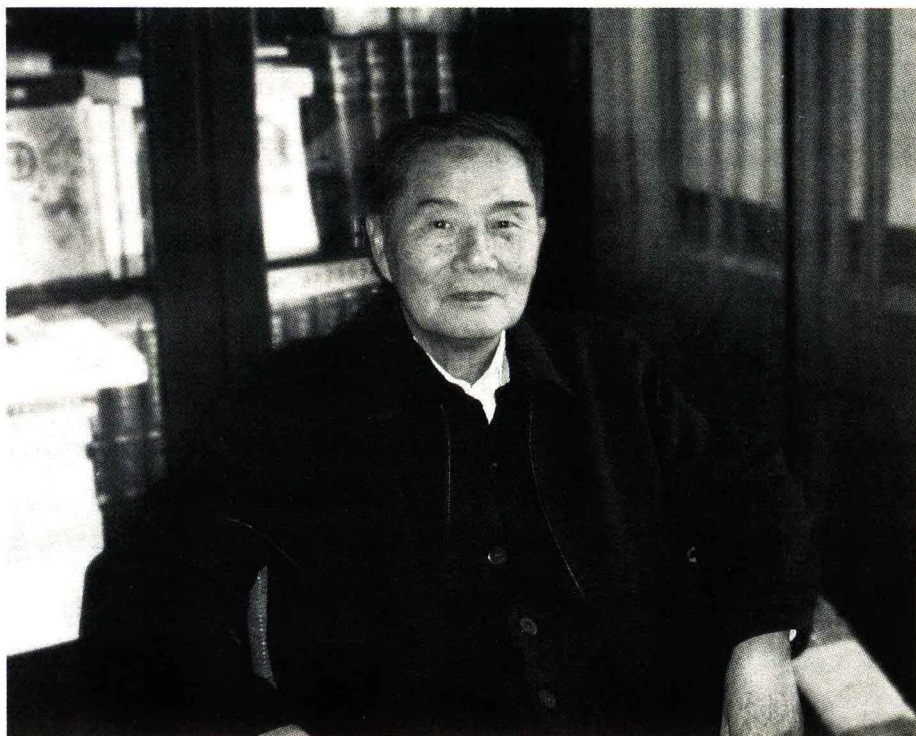
定 价 / 89.00 元

印 张 / 23.5

字 数 / 346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樊 骏 (1930-2011)

共同的事业（代序）

陆建德

模模糊糊地记得，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过道中或电梯上见过樊骏先生。但是，真正将他的面容看得真切的，是在两年前的遗体告别会上。那是一次文学教学与研究界悲伤的聚会，人们在含泪悼念一位出色的学者、亲爱的师长的同时，深惧他所象征的品质和工作态度会离我们远去。樊先生奖掖后进，培植正气，在学术评价上不徇私情，有一种近乎迂阔的真率。他的真率来自无我的精神。希望这样的精神永在。

一位 19 世纪的哲人说，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取幸福而把心力用在别的追求上的人，才是幸福的。樊骏先生以无我之心投身于他所热爱的工作，他是一个幸福的人。想到这一点，追念他的时候，我们也感到一点快慰。樊骏先生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鞠躬尽瘁，绝无借此扬名的意思。在人文学术研究资金匮乏的时刻，他捐款设立现代文学学会的“王瑶学术奖”和文学所的“勤英文学研究奖”，条件是文学所必须为他保密。樊先生长期以来为社会和学术工作，举重若轻，自然而然，仿佛那是他的习惯，这一境界非有心做“好人好事”者所能企及。太史公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不能用于樊先生，因为他从来不会为了“名不称”而焦虑。欲称名于世者使他所从事的事业服务于自己，而樊骏先生将自己服务的对象看得远比自己重要。为此，我们向樊骏先生三鞠躬。

读了这本纪念文集里的文章，会对樊骏先生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我还想做点补充，稍微介绍一下他的中学经历。樊先生 1944 年 9 月到 1949 年 7 月就读于上海麦伦中学，该校原称麦伦书院，是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北伐成功后，在中国政府的干预下，学校取消了宗教方面的课程，但是保留了一些办学的特点，仍以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为重。说到麦伦中学，不能不提校长沈体兰先生。沈先生为麦伦订立了四项原则：树立高尚理想、养成社会意识、练习集团生活、实行公众服务。他是基督徒，热心捐助，更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希望学校能够“养成新国家公民，造就新人格青年”。麦伦中学的人格教育始终是在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樊骏先生从麦伦所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

这样的办学理念淡出个人，强调利他，绝不会把读书作为改变个人和家庭社会地位的手段。樊骏先生一度喜欢上教堂，也能接受一些基督教教理，但是有人劝他受洗入教，却被他一笑拒绝。他在麦伦念高中的时候喜欢写诗，大约在 1946 年或 1947 年，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生命是一把火，
不断地替人类发射温暖与光芒。
有人说：“世界是如此黑暗，人情是多么冷酷。”
这是他自己熄灭了生命之火。
别怕木头会被燃烧，燃烧才能增加更大的火苗；
一块木头的毁灭，
光芒与温暖才能永远不绝。

樊先生少作里的“生命之火”是去我的，甚至是随时准备做出自我牺牲的。有了这样的生活态度，就不会悲悲切切，满腹牢骚。何其芳同志在延安写的诗《快乐的人们》里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是一堆红红的火。”他笔下“快乐的人们”深入广阔的生活：

去过极寻常的日子，

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
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
去以心发现心。^①

在麦伦中学念书的樊先生读过何其芳同志写于延安时期的这些诗吗？可能没有。但是从上面所引的这些诗行里，我们看得出，燃烧的木头和快乐的人们其实非常相像，他们都对人生与社会张开双臂。传统文学中不遇的诗人总是抱怨社会黑暗，自己太高洁，反而不为世所容。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唱着“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的调子，实际上是对“平凡的事物”闭上了眼睛，那样的态度不是熄灭“生命之火”，就是走向自我封闭。世界并不会因有这么一堆愁眉苦脸、自我欣赏的人而变得光明。

樊骏先生进北大的时候，正值新中国成立。对自己的祖国，樊先生有一颗拳拳之心。在现代作家里，樊先生研究得最多的是老舍，也许后者的温和宽厚与樊先生的性情比较相合。他多次强调，老舍1949年从美国回国，有其必然性。他曾引用老舍一篇文章，里面说到初冬时节轮船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老舍爱恋故土，刻骨铭心，回国是他必然的选择。樊骏先生跟老舍一样，对新中国满怀期待，欲以自己的燃烧给周围带来“光芒与温暖”，同时他又敏锐地感受到正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变革。

历史变革的参与者总想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祖国发生的一切。1950年，学校曾组织学生到东长安街参加义务劳动，樊骏先生就奇怪，为什么北大校内有些倒塌的房子，断墙碎砖需要清理，大家视若无睹，反而挤到大街上凑热闹。他坦率发问：是不是非要报馆记者来采访、拍照、大事宣传了，大家才去劳动呢？也就是说，义务劳动不是形象工程，专门摆出样子来给人看的。

^① 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

真正具有主人翁负责任的态度的人，才说得这样的话来。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听取中肯的意见，要取得踏踏实实的进步就很难。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一度不能开明地对待这样的意见。樊骏先生在1957年的整风鸣放运动中，有些不合标准的言论，也在意料之中。为此他还被开除团籍。文学所党总支已在1978年对此事进行复查，认为当时开除团籍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改正。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樊先生依然故我，他身上的“生命之火”不会因为个人的境遇而熄灭。

樊先生1953年从北大一毕业就分配到文学研究所，由于他是单身，久久没有自己的住房。他长期住集体宿舍，在20世纪60年代，还以文学所的办公室为家，面北的书桌旁就是一张单人床，而他的八个书架正好用作影壁。樊先生在同辈研究人员中，算是藏书丰富的。一直到1980年左右，樊先生才分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于是这些图书跟着他也搬了家。近三十年我国文学事业兴旺发达，樊先生的私人藏书也在不断扩展。

樊先生去世后，他的弟弟樊绘曾先生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藏书捐献给文学所。为此，文学所在小会议室腾出地方，定制了一些书架，作为存放、陈列樊先生图书所用。文学系的贺嘉钰、程帅和刘玉静三位同学花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将这些图书整理、编目完毕，她们十分辛苦，脸上却透出喜悦，因为这项任务对于她们而言，是爱与崇敬的劳作。有位同事看到这些樊先生生前不时翻检的书籍，感到他的精神永在，不禁脱口而出：“樊骏先生又来上班了，还是住朝北的办公室！”目前这些书籍已经上架，只是它们摆放的位置不同于安贞桥书房，樊先生如要使用，恐怕还要耐心寻找。

文学所的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唐弢先生于1992年逝世后，樊骏先生曾撰文纪念。他说，唐弢先生未了的工作也就是下一辈的任务：“我们这些生者，面对这些未了的工作，除了遗憾，肩上还多了几分责任——共有的遗憾，本来就源于共同的事业，因此，也只有借助于共同的事业的不断发展，才得以逐步消解。”樊骏先生辞世后，我们这些生者也感到了类似的源于共同事业的遗憾与责任。相信文学所的同人会继承樊先生的精神遗产，真正推进几辈学人为我们奠定了基础的共同事业。

目

CONTENTS

录

共同的事业（代序）	陆建德 / 001
亦友亦师指路径	
——铭感樊骏同志对我的研究课题的关心与指导	范伯群 / 001
缅怀樊骏学长	严家炎 / 009
风范与人格	
——记樊骏先生	钱中文 / 014
樊骏未了的心愿	王 信 / 020
一尊镌刻于心头的精神雕像	
——怀念樊骏	刘增杰 / 024
“烟涛微茫信难求”	
——深切怀念我尊敬的樊骏先生	孙玉石 / 033
永存的风范无尽的怀念	沈斯亨 / 038
沉痛悼念樊骏学长	陆永品 / 043
樊骏琐忆	张大明 / 045
遥寄樊夫子骏公	陈全容 / 053

倾盖如故说樊骏	钱碧湘 / 057
我的樊骏兄	何西来 / 059
樊骏学长的最后时光	裴效维 / 063
给《丛刊》带来品格精魂	吴福辉 / 068
追忆樊骏先生二三事	沈太慧 / 073
怀念樊骏	王保生 / 076
想念您，樊骏好兄长	刘再复 / 084
谈樊骏老师，并谈及相关的一些事	刘 纳 / 095
“三不”与“三悟”	张梦阳 / 111
“今之人谁肯迂者！”	
——写在樊骏先生去世之后	赵 园 / 113
怀念樊骏先生	杨 义 / 118
一个“有故事”时代的消歇	温儒敏 / 122
记忆中的樊骏先生	陈子善 / 125
怀念樊骏先生	商金林 / 128
一个民族文学研究者的追思	关纪新 / 135
樊骏印象	战嘉悌 / 140
书生烦恼	
——怀念樊骏先生	严 平 / 153
告别一个学术时代	陈平原 / 162
樊骏先生点滴	张中良 / 165
“樊”门立雪	李光荣 / 171
忆樊骏先生	王培元 / 179
怀念樊骏	刘福春 / 184
怀念樊骏老师	关爱和 / 192
书生风范	
——怀念樊骏先生	殷国明 / 194
从未说出的感念	李 今 / 197
感念樊骏先生的言传身教	汪文顶 / 201

为樊骏先生送行	王泽龙 / 207
此生何幸遇恩师	
——悼念樊骏师	逢增玉 / 209
“夜空中晶亮的星辰”	
——怀念樊骏先生	黎湘萍 / 217
樊骏：一个真实的神话	魏 建 / 221
旧文续补：怀念樊骏先生	解志熙 / 224
新时期老舍研究的领军人樊骏	吴小美 / 235
学科魂	
——《樊骏论》之第一章	王富仁 / 240
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	钱理群 / 253
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其实还很年轻	
——从樊骏先生的一篇文章谈起	陈思和 / 290
学科评议、“时代”与文学研究中的总体意识	
——对樊骏先生学术工作的一些初步理解	程 凯 / 305
樊骏与现代文学学科队伍建设	宫 立 / 315
寻找别一位樊骏先生	
——读《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慈明亮 / 336
樊骏著作年表	宫 立 / 349
樊骏先生追思会致辞	刘跃进 / 359
编后记	/ 361

亦友亦师指路径

——铭感樊骏同志对我的研究课题的关心与指导

范伯群

樊骏长我一岁，我总视他为同行中最值得尊敬的“学术兄长”，尽管我们见面的机会大多是在各种会议上。每次开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理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时，他往往要作一次总览近期全国现代文学教研成就与缺失的长篇发言，他“纵览全局”“紧扣要领”，并能建言今后的努力路向。每次听完他的发言，我总感到获益匪浅。把他的发言看做是对会议有指导性的“主题报告”，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我们现代文学界的有权威性的“学术发言人”。我们虽然年龄相仿，可他实在是配得上做我的老师。我们私下里当然也有交往。例如1979~1980年，我为写《冰心评传》常到北京拜访谢老，或查找她早年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每次，我都“下榻”在崇文门第二旅社，那旅社每个房间五张双层床，住十位旅客。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正拆了老房子准备盖新大楼，也正好将住集体宿舍的人安排在这个旅社里“过渡”。于是我每到北京就能与樊骏做“邻居”。他们不是“旅客”而是“住家”，因此每人独占一间。我白天“泡”图书馆，晚上就常到樊骏的房间去打扰他，向他请教问题。又如在1982年我请他到苏州大学来讲学，他说自己不善于上大课，如果小范围地讲两次是可以的。因此主要的听众是我们现代文

学学科的教师和准备考现代文学研究生的同学。我们又向他请教了许多学术上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樊骏对我指导，使我受用不尽的是我后半生的主要研究课题，也是他对我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关心、鼓励与启发。

我们教研室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接受文学研究所的编写“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卷的。于是我的个人研究课题也将重心转移到通俗文学领域中去。在当时，这一“转向”曾在某些同行中引起一些“不解”与“哗然”。但是樊骏支持我的“转向”，认为这是很有价值、值得作深入探讨的课题。

在 1983 年 5 月《文艺报》召开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会上曾“对‘现代文学’是否相当于‘新文学’，能否将鸳鸯蝴蝶派之类的作品写入现代文学史，也有针锋相对的分歧意见。”但樊骏的学术观点是鲜明的，他对所谓“新”“旧”的界限作了这样的横向比较：

再与其他艺术门类作横向的比较，更会发现它们并无类似的严格界定：美术界没有将同属传统形式的中国画一概视为旧美术、音乐界没有完全把民族音乐作为旧音乐、书法界更难有这样的新旧之分，而将他们写入现代美术史、音乐史、书法史之中。如果编一部综合的“中国新文艺史”，写到了齐白石、张大千的画作，梅兰芳、周信芳的剧艺，阿炳的乐曲，罗振玉、郑孝胥的书法等，却不提鲁迅、郁达夫、柳亚子、毛泽东等人的旧体诗词，张恨水、金庸等人的章回体小说，岂不荒诞不经？难道后者比前者缺少“新”的属性吗？这就需要对艺术上的“新”“旧”，作出全面系统的理论阐释。^①

在交谈中，樊骏向我表达过这一学术观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研

^①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2006，第 510 页。

究路向有支持的作用；推而广之，对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格局“拨正”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1986年，我申报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课题被批准为“七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虽然在申报之前，我已经在通俗文学领域中“转悠”了五六年，手边已有若干资料与积累；但是说来惭愧，许多有关理论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相应的解决，我就写信给樊骏，将我经常在脑海中盘旋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向他求教。这封题为《关于编写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通信》的文章曾刊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3期上。在2009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选·文学史研究·史料研究卷》（第74~77页）上又选载了这封我给樊骏的信。我当时刚拿到这册精选本时，直觉的反应是，我在丛刊上发的文章也比较多，为什么编者别的不选，偏要将我当时思想上“一团乱麻”的文章再次呈现在同行的眼前呢？不过我很快就释然。我觉得选家是有一定眼光的，这正好说明一个研究者的“转轨”，去触及一个新课题时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向他提了这么多的问题，不当面促膝谈心是无法回答的。但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那篇文章中还是用前瞻的眼光，看好通俗文学的研究，他在谈到《丛刊》刊发论述鸳鸯蝴蝶派文章时说：

前不久又有“通俗文学研究”专栏等。这些文章不一定都已引起普遍的注意，一些主张还处于倡导的阶段，尚未成为同行间的共识，更没有成为共同的实践。不过从长远看，可能会触发这门学科总体格局的变动；或者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或者扩大中国文学的外延，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①

^①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第422~423页。

他的这些意见，支撑着我们课题组更努力去完成“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在我主编的那部140万字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正式出版之前，为了慎重起见，我写了长达51页的章节题目与论点提要先请专家们审定。樊骏在回信给苏州大学季进的信中，对提要发表了很多鼓励性的意见，要季进转告我：

看了《通俗文学史》的论点提要，觉得这不仅是一部内容详尽的文学史，为人们打开了一个陌生的文学世界，而且是一份为现代通俗文学争得应有历史地位的宣言书（使人联想起当年胡适编写《白话文学史》为白话文学作历史申辩的那种作用）。两者都是有学术价值的，但后者会引起一系列的争议。

当然，我与胡适是无法比拟的；但在樊骏看来，为某种被歧视而有一定价值的文学史现象进行“历史申辩”却是类同的。樊骏要我做好思想准备，此书一出，会有一系列的争议。我也深知这是必然会产生的后果之一。别说是在当时，直到现在，也有同行仍然“质疑通俗文学史”。但是这是学术问题，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学术讨论中从长计议和反复辩证的。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后，在2000年6月10日樊骏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后来他扩写成了一篇文章，题为《能否换个角度来看》，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上^①。他一方面对我们课题组的工作，进行了鼓励，衷心祝贺这部史书的出版：“把鸳鸯蝴蝶派文学纳入视野、提上日程，尤其是把它作为独立的重要的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一大进展，也是我们文学观念、文学史观有了变动的鲜明标志。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是这一进展和变化的重要成果。”他认

^① 此文已收入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第477～482页。以后凡加引号而不说明出处的均出自樊骏的这篇重要文章。

为这本书“向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的轻视、歧视、无视‘鸳鸯派’的历史偏见提出挑战，给它以新的历史定位和评价，更显示出可贵的学术勇气。人们不一定会一一认同书中提出的见解和结论，但就认识这段文学历史和这一文学流派而言，《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但是在肯定我们课题组的成绩的同时，对我执笔的《绪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以自己对现代文学史的深湛研究，高瞻远瞩地作出了他对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建树与历史地位的评价，指出了我执笔的《绪论》的不足，希望我“能否换个角度来看”。他的见解是非常辩证而富有历史感的，使我心悦诚服。所谓“换个角度看”，就是我对“纯”与“俗”的对立，看得太绝对化了，他认为容易造成新的混乱。他指出，既要看到“‘鸳鸯派’和新文学诚然是不同的流派，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在历史进程中，在不少的具体事例中，又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似相通的。”因此，他认为《绪论》没有从“比较先后出现的‘鸳鸯派’和新文学的同和异，再进而考察各自的历史位置和优劣得失。”他将以市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鸳鸯派，与原先局限于士大夫狭小圈子的旧文学相比，给鸳鸯派一个相当高的评价，提出了他非常精辟的见解：

它在面向较为众多的接受群体，内容较为贴近社会现实，形式上注意借鉴现代手法技巧等方面，都是历史的超越与创新，它也因此迅速取得文学市场的巨大份额，成为20世纪最初三四十年代里相当活跃的流派。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换中，比之五四新文学，它在好几个方面（比如文学的平民化、世俗化、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倒是个先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它称作“前现代（化）文学”“前新文学”，也不为过，至少是得风气之先，在新文学之前作过一些探索，取得若干成就，起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是“鸳鸯派”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主要建树和历史地位。

读了樊骏的这段论述，我真被他那明快而深刻的论证所折服。我执笔的《绪论》缺乏史家的眼光；而樊骏却能一针见效地击中历史的“穴位”。但樊骏的论点并非到此为止，他再进一步发挥道：

“五四”之前，“鸳鸯派”应该说是当年文坛上一个最有影响的新的流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就文学写作传播等环节而言，现代报刊事业→现代稿酬方式→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专业作家“三位一体”体制的确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体制实现了文学的商品化，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商品化，文学事业的物质生产过程就难于摆脱传统的种种羁绊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这方面，新文学步的是“鸳鸯派”的后尘。

樊骏在新文学与鸳鸯派的对立之外，看到了他们之间在历史长链中的连接点。这一层道理被他点穿之后，我好像觉得从士大夫狭小圈子的旧文学→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鸳鸯派→新文学之间的发展路径，从此要有新的历史诠释。

当然，樊骏在肯定鸳鸯派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指出新文学和鸳鸯派之间的差异、对立也是明显存在的。新文学家的主流“比之‘鸳鸯派’文人又具有远为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受到过远为先进的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的洗礼……着重在思想艺术各个方面提高作品文本的现代品格，创造出充分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将文学的感化教诲作用而不是消闲娱乐功能放在首位；为人生为革命服务的功利主义往往多于单纯的经济目的……是新文学与‘鸳鸯派’的一些明显区别。”而鸳鸯派往往“疏离于现实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在自己营造起来相对闭塞的文学环境和相当凝固的艺术氛围中，他们一如既往地生产经销主要作为供人消遣娱乐的商人的作品”，因此未能和新文学一起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他这个结论也是可以得到公认的。文章似乎本来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是樊骏还将论点延展下去，他敏感地觉察到，现在又有一个市民社会回归的现实问题：